

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對青少年至 成年初顯期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之探討*

陳亦柔**

陸偉明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憂鬱症狀的發展是心理與教育界甚為重要的議題，但從青少年到成年初顯期的軌跡卻少被探討。本研究藉由「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資料庫中2002至2009年間三波次（國三、高三、大四）共992位固定樣本採用二因子潛在成長曲線模式之隨機截距隨機斜率模型，來探討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對憂鬱症狀之發展軌跡。研究發現憂鬱症狀除穩定下降的一組外，另還有上升的一組。有以下四個重要結果：

（1）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的國三分數皆負向影響後續變化幅度。另，高憂鬱組在此三變項的平均分數皆較低憂鬱組低，且波動也較大。（2）自尊的重要性相對高於親子與師生關係；不論高低憂鬱組，國三自尊分數皆負向影響憂鬱症狀分數，自尊的變化幅度也負向影響憂鬱症狀的變化幅度。但在高憂鬱組，國三自尊分數卻對憂鬱症狀之變化幅度有正向影響，顯示過高自尊可能的問題。（3）低憂鬱組的國三親子關係負向影響憂鬱症狀分數，但高憂鬱組之親子關係變化幅度會負向影響憂鬱症狀變化幅度。（4）最後，低高憂鬱兩組的師生關係分數對憂鬱症狀變化幅度皆無明顯影響，僅在低憂鬱組的國三師生關係分數負向影響憂鬱症狀分數。本研究發現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在青春期末到成年初顯期，會因憂鬱症狀高低而對個體有不同效果，並據此提出教學與輔導相關建議。

關鍵詞：自尊、師生關係、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憂鬱症狀、親子關係。

*本文由第一作者學位論文改寫，感謝陸偉明教授的指導，及吳齊殷、董旭英教授給予的建議，也感謝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的編輯及委員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文中論述更加完整。

**通訊作者：陳亦柔，email: u36071011@gs.ncku.edu.tw。

DOI: 10.53106/172851862022010063003

壹、緒論

隨著時代變遷，壓力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與其息息相關的憂鬱（depression）也普遍受到重視。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統計，目前世界上約有2.8億人受憂鬱症影響，這也成為了社會疾病負擔的主要因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國內有關憂鬱症的評估，精神醫學之專業人員主要是透過個體出現憂鬱症狀的嚴重程度及症狀的持續時間來診斷。研究也發現若個體在青少年時期持續出現憂鬱症狀（depressive symptom），可能會延續到成年並對其各面向產生負面影響（Kim et al., 2003）。但在國內研究顯示，就算個體覺察到了自身憂鬱，也可能會因為文化價值觀的威脅、擔心被汙名化而壓抑了求助行為，延宕了心理專業介入的時機（張虹雯、王麗斐，2015；張虹雯、陳金燕，2010），這顯示了探討個體憂鬱歷程的重要性。因此，受惠於近年來大型追蹤資料庫的建立以及新興的統計方法，若得以深入探討個體憂鬱症狀的成長軌跡情形，可進一步確立影響憂鬱症狀變化趨勢的機制，並提供家長、學校或輔導單位參考，以協助預防與減緩各時期憂鬱症狀的發生。

回顧過往有關憂鬱症狀研究發現，如低自尊、不良親子關係與低教師支持等都會導致偏高的憂鬱症狀（王郁琮，2013；呂玟承，2017；黃昱得，2014；黃鈺婷，2011；Orth et al., 2008; Sowislo & Orth, 2013）。近年來的研究轉而關注個體生命歷程中存在著哪些因素能給予個體支持並幫助其度過困難，比如說高自尊、良好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周玉慧，2015；陳杏容，2017；簡伶蓁，2009；Brausch & Decker, 2014; Sabol & Pianta, 2012）等因素不但能幫助緩衝個體成長歷程中由負向經驗帶來的影響，也能在未來個體面對壓力時協助其順利度過困境成為緩解個體憂鬱症狀的保護因子。另外，根據「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 Theory）」的觀點（Bronfenbrenner, 1979），個體發展取決於系統間交互作用後的結果，其「近側歷程一個人特徵－環境脈絡－時間」模式（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model，簡稱PPCT模式）更進一步地將個體發展視為個人特質、環境脈絡、時間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李佩珊，2019）。這意謂著除了與家庭、學校環境間互動關係的影響，時間系統帶來的變化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從國外文獻得知，個體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developmental trajectory）隨著成長歷程之差異而有不同變化（Ge et al., 1994; Wickrama et al., 2009; Wu, 2017），因此，在時間脈絡下檢視各重要因子對憂鬱症狀軌跡之影響，才能了解其影響個體生命歷程

中憂鬱症狀發展的因果關係。有關影響憂鬱症狀的重要因素，許多研究從生態系統理論裡的個人、家庭環境或學校環境的層面切入（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劉宗幸、江守峻，2020），然而，國內憂鬱縱貫研究自青少年時期追蹤到成年初期者截至目前為止只有兩篇（呂玟承，2017；Yi et al., 2012），尚缺乏同時將個人因素與親子、師生關係等重要他人之生態因素納入探討其對青少年至成年階段憂鬱症狀影響之研究。在個人因素中，自尊往往被視為一種與憂鬱症狀具有高度關聯的特質，指的是個人對自我的整體評價（Rosenberg, 1986），被認為是心理功能的核心面（Taylor & Brown, 1988）。自尊較高者自我評估較為正向，自我概念與自我理想（self-ideal）也較能配合；自尊偏低者則是個體傾向對自身進行負向評估，情緒狀況較不穩定，在面對失敗等壓力事件時會有較多負面情緒感受，也較容易感到被拒絕與批評（Bernichon et al., 2003）、產生自殺意圖（McGee et al., 2001）等。親子關係則是發生在家庭中，由父母和子女間的互動所形成的一種人際關係（黃春枝，1986）其重要內涵之一為情感上的依附感。當個體與重要他人（如父母）互動時，若得到正向情感回饋與維持良好關係，未來將能發展出正向的內在運作模式，進一步幫助個體適應壓力情境（Bowlby, 1973）。至於師生關係是學校環境中重要的人際關係，給予學生保護、幫助其能夠順利發展、調適，許多實證研究也證明了師生關係之於個體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性（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Pianta et al., 2003）。立基於上述文獻理論，本研究目的首先要探討在生命歷程中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三個重要變項的發展軌跡，接著探討這些變項對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也就是這些變項的起始狀態（initial status）與變化幅度對憂鬱症狀（起始狀態與變化幅度）的影響，才能將發展軌跡與變化的機制解釋清楚。

在成長歷程的理論中，Arnett（2000）提出的生命階段觀點認為個體在青春期末後、邁入成年期前，約於二十多歲時應該獨立出一段模糊不定的探索時期，遂將此階段命名為「成年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鑒於現今受教育時間延長，在此時期中個體傾向給予自身更多時間探索未來生涯志向與可能性，顯見成年初顯期對個體而言是一個充滿生涯可能性與挑戰的階段。由於國內過去文獻受限於長期追蹤的困難，較少涵蓋青春期末至成年初顯期之研究，在現有研究中，呂玉瑕與周玉慧（2015）透過國三（15歲）到成年初期（26歲）共四波資料來建構青少年的性別角色態度形成，研究結果顯現出在成長歷程中生活經驗、家庭等因素在其中的交織影響。故本研究在探討憂鬱症狀時，也希望透過納入成年初顯期來進一步了解自尊、親子關係、師生關係於不同成長階段在個體憂鬱症狀的發展情形。

為了解長期變化情形，需要對同一批樣本的長期追蹤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選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建置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TYP）」¹。此資料庫以生命歷程的角度檢視青少年期與成人期間的連結，問卷範圍包含生命歷程的社會脈絡如家庭與學校等，各波次均持續對個體憂鬱症狀進行追蹤調查；另外，本研究之變項（如憂鬱症狀、自尊、親子及師生關係）所選取之題項多已通過多次研究檢驗（王郁琮、李佳儒，2018；江守峻、陳婉真，2018；呂玟承，2017；周玉慧，2015），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在波次的選擇上，本研究選取TYP所釋出2002至2009年間國三、高三與大四（成年初顯期）的固定樣本長期追蹤資料進行研究（伊慶春，2008，2019a，2019b），從Yi等人（2012）的研究可以發現台灣學生在此三個時間點均反映出偏高的憂鬱症狀分數，因為個體皆面臨到有關未來生涯的抉擇及各方壓力。在這三個時期，個人的心理因素、環境的社會支持因素是否能提供個體良好支持以降低其憂鬱症狀，就顯得格外重要（王玉珍、吳麗琴，2009）。故本研究納入各時期自尊、親子及師生關係的發展軌跡，來探討各變項是如何影響憂鬱症狀的發展軌跡。至於在資料分析上，則適合使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LGCM）（余民寧，2013），該方法不受測量時間需等距的限制，並可分析各階段之起始狀態（截距）與變化幅度（在不同階段之斜率）。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 （1）在國三到大四間，自尊、親子關係、師生關係的發展軌跡為何？
- （2）在國三到大四間，自尊對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影響為何？
- （3）在國三到大四間，親子關係對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影響為何？
- （4）在國三到大四間，師生關係對憂鬱症狀發展軌跡的影響為何？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形成

一、憂鬱症狀及各解釋變項的發展軌跡

由於個人成長背景、個性特質的不同，青少年至成年初期憂鬱症狀的變化也不盡相同。國外研究顯示青少年早期至成年初期，憂鬱症狀大約呈現持續上升的線性趨勢（Kessler et al., 2001）。而研究結果也指出若是在青少年早期出現憂鬱症狀，在成年期時出現的可能性會隨之增加（Reinherz et al., 1999）。憂鬱症狀的變化趨勢在國內

的研究則有不同結果，周玉慧（2015）在使用TYP資料庫探討心理健康時發現台灣學生於國三時憂鬱最高、在成年後（26歲）最低。另外，Yi等人（2009）、Yi等人（2012）使用TYP亦發現台灣學生的憂鬱症狀分數隨著教育考試而起伏變化，如青少年在國三、高三升學關鍵時期明顯上升。不過，王郁琮（2013）也注意到台灣學生憂鬱症狀的異質性發展；隨著生命週期，有些學生的憂鬱會下降，但有些會上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在TYP的研究顯示，青少年在國一時的憂鬱症狀起始分數，並不會影響到在國二、國三時的變化幅度，但後續的變化幅度會受到生活脈絡中的其他重要因素影響。本研究依序探討個人自尊、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對憂鬱症狀的文獻，以下先就各解釋變項自身的發展軌跡之研究進行說明。

自尊為一種個人特質，雖然相對穩定，但也並非一成不變，會隨著個體成長及時間推移而變化（Baharudin & Zulkefly, 2009）。如果對於自尊進行動態分析的縱貫研究，相較於橫斷研究更能全面探討自尊的變化與各階段的相關因素影響。從國外文獻可以知道，自尊在童年時期相對較高，在青春期中下降，到成年中期呈現增加的趨勢（Birkeland et al., 2012; Orth et al., 2012）。至於在國內研究方面，巫博瀚與陸偉明（2010）使用TYP資料庫發現國內國一至國三的青少年自尊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周玉慧（2015）同樣使用TYP則發現18至26歲自尊呈倒U型的曲線變化。另外，在國內有關自尊的縱貫研究也指出，自尊的起始狀態會負向影響其變化幅度，意謂早期若是低自尊的話，未來自尊的變化幅度會更大（巫博瀚、陸偉明，2010；吳齊殷、黃鈺婷，2010），可見早期自尊的重要性。若僅憑單一時間點的測量，是無法完整呈現自尊的跨時間變化軌跡的（Singer & Willett, 2003）。由於國內外的研究結果並不相同，自尊發展的趨勢值得進一步研究。

家庭關係會因為成員的發展互動而發生變化，是一個動態的社會系統，由此可知親子間關係並非永久不變。在親子關係的變化中，子女的成長與獨立在過程裡扮演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黃德祥，1994）。子女在青春期中開始遭遇了角色、情緒適應等危機，此時由於父母多數也已邁入中年階段，人生中同樣面臨著許多危機，兩者間的關係於此階段將面臨新的調整（Ausubel, 2002），研究顯示此時親子關係較為緊張，親子間衝突也較多，更會對個體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Branje & Meeus, 2017）。在個體的發展階段中，大學離家、成年期也是一個重要的轉變過程，此時個體將重新調整與評估與雙親的關係。當子女離開父母與原生家庭後，此階段的親子關係通常會產生正向的改變，因為此時父母被子女視為情緒支持的來源，親子間的衝突也隨之降低（Pipp et al., 1985）。值得注意的是，國內親子關係變化的研究與國外研究結果並不

完全一致。林惠雅與蕭英玲（2017）研究使用TYP進行探討，結果顯示雖然國內學生國一至國三的親子滿意度下降的現象與國外研究結果一致（Ogwo, 2013），然而在國三到高三時，國內青少年知覺的親子關係滿意度卻依舊持續明顯下降，與國外認為青少年晚期親子連結逐漸緊密、衝突降低的結果並不一致（De Goede et al., 2009）。此外，黃鈺婷（2011）使用TYP探討924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發展軌跡也指出，親子關係的起始狀態會負向影響未來關係的變化幅度，可見早期親子關係的重要性。但是有關成年初顯期的變化尚無追蹤之證據，值得進一步探討。

最後，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會歷經不同教育階段與環境變化，在這個變動歷程中，個體本身也歷經了生理、心理與認知發展的數個階段，因此就算個體在初期擁有良好師生關係，後續的師生關係也不一定能維持相同品質。相關研究顯示師生關係的品質在幼稚園與國小階段最佳，自學生進入中學後開始下降且愈來愈差（Midgley et al., 2002）。Reddy等人（2003）針對中學階段成長模型發現，起初的師生關係將會對後續的師生關係變化幅度有負向影響，顯示了一開始所奠基的良好師生關係，可進一步降低後續關係的變化趨勢，但是國內尚缺這方面的追蹤研究。

針對以上文獻探討，可知變項的軌跡變化需要延伸到成年初顯期，且需要從截距與斜率來探討，故以下針對三個解釋變項形成研究假設一：

H1a：在國三到大四間，自尊截距對其斜率有負向影響；

H1b：在國三到大四間，親子關係截距對其斜率有負向影響；

H1c：在國三到大四間，師生關係截距對其斜率有負向影響。

二、自尊與憂鬱症狀

在實證研究中，國外研究對自尊與憂鬱的影響機制提出了不同的解釋模型，如疤痕模型（scar model）認為低自尊可能是憂鬱所造成的結果（Rohde et al., 1990）；相對地，韌性模型（vulnerability model）則是認為低自尊能夠預測憂鬱症的發生（Orth et al., 2009; Zhou et al., 2020）。此兩種模型並非全然相互排斥，共同因素模型（common-factor model）就認為自尊跟憂鬱是本質相同的兩個極端，不該分別探討（Watson et al., 2002）。但這類說法後續受到了其他實證研究的反駁，實證結果證實在此三種模型中，以韌性模型來解釋自尊對憂鬱的影響較為合適（Orth et al., 2008; Rieger et al., 2016）。

在國內有關自尊與憂鬱症狀的縱貫研究中，黃鈺婷（2011）的研究有兩個發現，一是自尊的起始狀態會負向影響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也就是說，早期若是低自尊的

話，未來憂鬱症狀分數會更高。第二個發現是自尊變化幅度會負向影響憂鬱症狀的變化幅度，顯示若自尊增長趨勢越強的話，憂鬱的下降情形也會越明顯。此外，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也發現低自尊在憂鬱症狀的變化幅度也較大。但由於文獻上尚缺乏自尊延伸到成年初顯期的探討，故本文形成研究假設二：

H2a：在國三到大四間，自尊截距對憂鬱症狀截距有負向影響；

H2b：在國三到大四間，自尊截距對憂鬱症狀斜率有負向影響；

H2c：在國三到大四間，自尊斜率對憂鬱症狀斜率有負向影響。

三、親子關係與憂鬱症狀

在回顧親子關係與個體情緒的相關論述及文獻中可以發現，親子關係往往與青少年憂鬱有密切相關。若在青春時期若親子關係為疏遠及衝突，容易導致子女憂鬱症狀的發生，反之，若親子關係為正向、穩固，則能成為青少年憂鬱的良好預防因子（Rueger et al., 2010; Young et al., 2005）。親子關係對於個體的影響不僅止於青少年期，在個體成年後的憂鬱也被認為與生命歷程中的早期不良親子關係有關（Lewis et al., 2014; Szepeswol et al., 2015）。可見無論是在青少年期或是成年後，當探討到憂鬱症狀成因時，親子關係往往是一個重要的變項。

在憂鬱症狀的研究方面，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以及黃鈺婷（2011）的研究顯示親子關係起始狀態，會負向影響憂鬱症狀的起始分數，但不會影響其變化幅度。不過，在簡伶蓁（2009）對「兒童與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中1,646位國中生樣本的縱貫研究顯示，家庭支持的下降幅度越大，憂鬱症狀的上升幅度越大，故對於長期親子關係變化幅度對憂鬱症狀變化幅度的影響，研究上應予以探討，並可進一步延伸至成年期探討長期影響。另外，考量過去文獻中親子關係起始狀態對憂鬱症狀變化幅度的影響並不顯著，故綜合以上文獻及論述後，形成研究假設三：

H3a：在國三到大四間，親子關係截距對憂鬱症狀截距有負向影響；

H3b：在國三到大四間，親子關係斜率對憂鬱症狀斜率有負向影響。

四、師生關係與憂鬱症狀

在國外師生關係對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中，學生主觀感受的教師支持為預測青少年憂鬱症狀的重要變項。尤其是進入青春期的身心變化劇烈，許多研究均證實此時個體若感受到良好師生關係，除了可以增強青少年對學校的歸屬感，也可以減少未來出現心理疾病和憂鬱症狀的可能性（Hughes et al., 2001; Wang et al., 2013）。相對地，若此時學生意識到教師對自己的支持減少，也會出現憂鬱症狀增加與自尊心下降的現象

(Fredriksen & Rhodes, 2004)。在高中時期，師生關係也被證實與學生的心理健康有關，若教師支持減少，學生的自尊與憂鬱症狀皆會惡化(De Wit et al., 2011)。在大學時期，師生關係則被描述為「成人與成人的關係」(Halx, 2010)，研究顯示與大學教師的良好關係對學生的動機、滿意度、成就和智力發展等方面依然會產生正向影響(Calvo et al., 2010; Zepke & Leach, 2010)。因此，若個體能與教師維持良好師生關係，不僅能減輕憂鬱症狀、有助心理健康，也能為未來情感和行為發展奠定良好基礎(Simons-Morton et al., 1999; Wang & Eccles, 2012)。

至於師生關係與憂鬱的國內現有研究，許馨麟(2013)發現國中時期師生關係越好，學生憂鬱情緒越低。其他研究多為探討師生關係與各變項間相關性，如林淑惠(2015)發現高中教師領導行為層面運用程度愈高者，學生幸福感也愈高；黃玉(2000)研究則顯示，高師生互動能顯著正向影響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從上述文獻可推測在此兩階段中，良好師生關係依然能減輕學生憂鬱症狀、對其心理健康產生正向影響。

在縱貫研究方面，國外Wang等人(2013)的縱貫研究發現在中學階段的師生關係起始狀態會對後續的師生關係變化幅度產生負向影響，顯示了一開始所奠基的師生關係越差，後續關係的變化幅度越大。在國內方面，魏琦芳(2008)以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探討高二至高三兩波10,171位高中生的心理健康情形，研究中將師生關係分為負向與正向兩種，結果顯示負向的師生關係會影響學生當下與未來心理健康，其結果與國外研究一致。但與國外結果相異的是，研究發現正向的師生關係並不影響心理健康，研究中認為是因測量題項僅詢問學生對於教師教學是否認真，導致不易發現師生關係對心理健康的正向影響。另外，黃鈺婷(2011)的研究則有不同結果，顯示青少年在國中三年間，若國一時感受到親近的師生關係，後續憂鬱症狀變化幅度反而較大。該研究者推測此結果是由於青少年受到老師期許時，反而會成為壓力，進而展現在其憂鬱症狀發展軌跡上，此發現反映了台灣的師生文化，值得進一步探討。由於目前台灣的文獻尚無探討師生關係到成年初顯期，且從國外文獻來看，師生關係的變化幅度可能會影響憂鬱症狀的變化幅度(Reddy et al., 2003; Wang et al., 2013)，故本研究形成假設四：

H4a：在國三到大四間，師生關係截距對憂鬱症狀截距有負向影響；

H4b：在國三到大四間，師生關係截距對憂鬱症狀斜率有負向影響；

H4c：在國三到大四間，師生關係斜率對憂鬱症狀斜率有負向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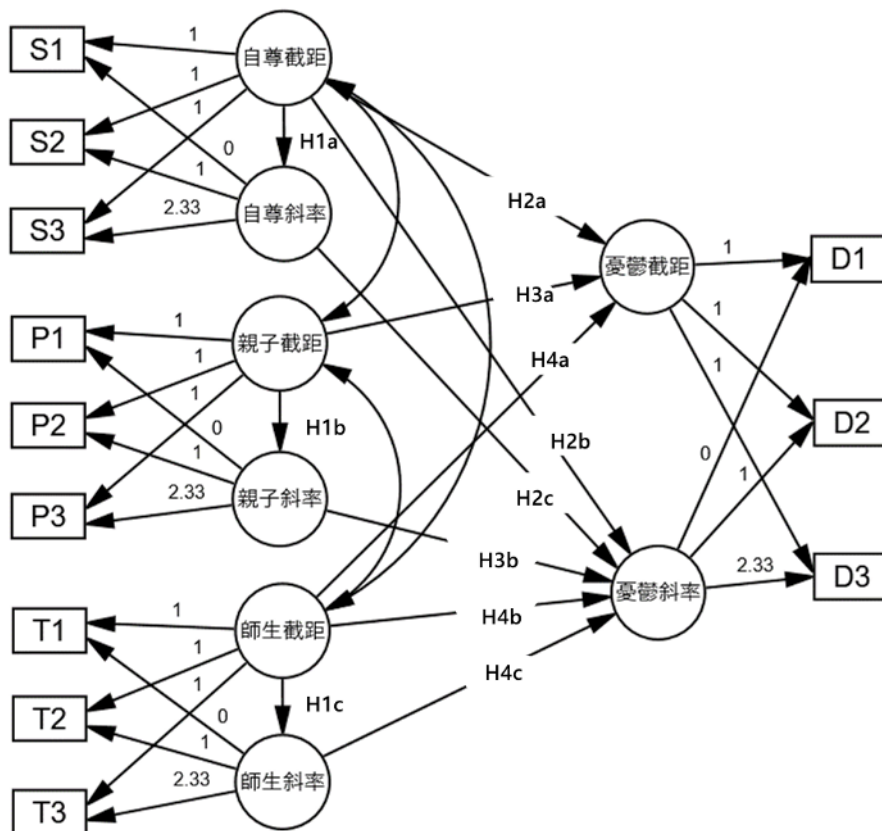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模型

依據研究目的、問題與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以LGCM來描繪個體於青少年至成年初顯期的自尊、親子關係變化軌跡，並以三個波次所測得之受試者分數（國三W1、高三W2及大四W3）作為各變項之「截距」和「斜率」此兩個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的測量指標（參看圖1）。

圖1

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影響憂鬱症狀之LGCM假設模型



本研究為隨機截距隨機斜率模型，研究中每一位填答者的起始狀態與變化幅度都能自由變動。在測量指標的設定上，第一個潛在變項「截距」為起始狀態，反映了本研究中受試者在三個時間點中所測量的起始分數，在本研究中的因素負荷量皆固定設為1，以利截距的解釋。第二個潛在變項「斜率」則是變化幅度，考量到資料測量時間點在W1到W2間隔三年、在W2到W3間隔四年，總共七年，故因素負荷量依波次年份間隔設定為0、1、2.33，用以估計三波的線性增加幅度，也代表每增加一個單位，實際年份間隔為三年。由於此模型中共有兩個潛在變項，為使研究模型與研究資料更加適配，在模型設定上本研究採取二因子模式，潛在變項的變異數皆會納入估計。

在各解釋變項對憂鬱症狀的潛在變項影響設定中，考量到本研究的第一個時間點為國三，個體的憂鬱已受到過去生命歷程中的自尊、親子關係的影響，為了正確呈現模型設定上的順序問題，研究中預設個體之國三憂鬱症狀「截距」會受到來自個體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的「截距」，也就是各變項的平均分數所影響。再者，為避免時間上順序錯置，設定各解釋變項的截距對憂鬱症狀的截距與斜率產生影響，但解釋變項的斜率皆沒有對憂鬱症狀的截距產生影響，只影響到憂鬱症狀的斜率。除此之外，本研究中也將三個解釋變項截距間的相關同時列入LGCM並進行分析，以納入解釋變項之間的相互關聯性。

圖1中呈現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整合自尊（S）、親子關係（P）、師生關係（T）的潛在變項以探討11個研究假設。

二、資料來源與處理

本研究使用TYP之長期追蹤調查資料，此計畫以台北縣市與宜蘭縣國中生為研究母體，於2000年第一波調查開始時分為兩批樣本（國一、國三生）分別進行追蹤，至2009年時，國一樣本共蒐集了九波資料，國三樣本則有八波資料。

此調查採取「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的抽樣方法，以「縣、市」作為第一分層，「鄉、鎮、市、區」發展的先後順序作為第二分層，再以叢集抽樣（cluster）為主，在第二分層內分二階段隨機抽樣，第一階段以「學校」作為抽出單位，第二階段以「班級」作為最終抽出單位，最後共計抽出40所學校，共81班，學生總人數為5,586人。其中國一學生樣本為2,696人，國三樣本為2,890人。由於國一與國三樣本的抽樣時間、問卷內容不盡相同，研究者評估研究方向與問卷題目，並考量樣本受訪時之生命階段後，選擇國一樣本之第三波（國三）、第六波（高三）、第九波（大四）為本研究之資料來源。此三波皆參與長期追蹤調查，且到大四仍持續在學的樣本共計

1,094名。在遺漏值的處理方式上，本研究採用完全除法（list-wise）的方式處理，經確認過後，遺漏資料排除後與原本資料特性無太大差異。最後在所有研究變項上皆提供完整資料的樣本為992名，被納為本研究進行資料分析之對象。本研究在變項處理上主要採用SPSS 23.0進行，在整併量尺時使用SPSS 26.0輔助，另外採用AMOS 23進行LGCM分析。

三、變項測量方式

（一）憂鬱症狀

本研究中使用TYP「不舒服的情形」等16題分數加總來測量個體之憂鬱症狀。其中包含「頭痛」、「鬱卒」、「擔心過度」、「失眠、不易入睡」、「不想活了」等16個題目，以符合Derogatis（1983）所發展的症狀檢核表（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 SCL-90-R）中憂鬱症狀五向度（體化症、敵意、憂鬱、焦慮及其他）。這些題項在三個時間點的信度 α 值分別為.83、.85、.87。題目為5點量尺，答項由1至5，回答「沒有」者為1分，「有，很嚴重」者為5分。本文從0開始編碼，0代表「沒有」，1代表「有，有點」，2代表「有，普通」，3代表「有，有點」，4代表「有，很嚴重」，最後將受試者每題得分加總得到個體的憂鬱症狀分數，分數愈高，代表憂鬱症狀愈嚴重。

（二）自尊

研究者採取Rosenberg等人（1995）對自尊所提出之整體性觀點，認為自尊係由個體對自我的總體評價所建構，亦即個體對自身的正負向態度、對自己滿意的程度。研究中選取TYP中各個波次皆有的六個題目：「1. 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2. 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3. 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4. 我很滿意我自己」、「5.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與「6. 有時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來反映自尊，這些題項在三個測量時間點的信度 α 值分別為.74、.78、.76，此變項的處理方式為先將第三、四題反向編碼，再從0開始編碼，0代表「很同意」，1代表「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很不同意」。最後將六題相加後即為該受試者自尊，分數愈高表示受試者個人愈高的自尊。

（三）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良窳能由個體知覺之親子關係滿意度反映（林惠雅、蕭英玲，2017；Videon, 2002），故研究中採用TYP之「與父、母關係的滿意程度」共2題分數加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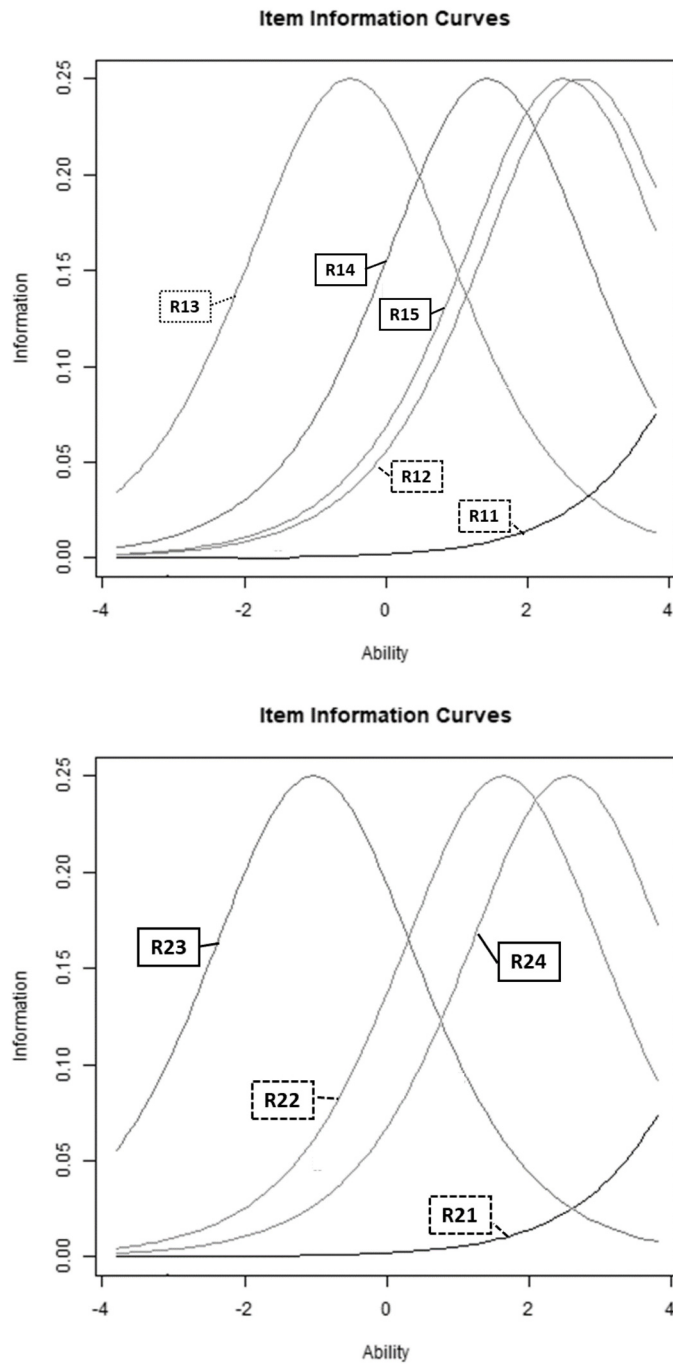
測量親子關係，三個測量時間點的信度 α 值為 .82、.78、.73。題目中包含「(1) 很滿意」到「(4) 很不滿意」四個答項，分別反映其對於與父、母親的親子關係滿意程度。將此兩題反向編碼後，再從0開始編碼，0代表「很不滿意」，1代表「不滿意」，2代表「滿意」，3代表「很滿意」，加總後分數愈高反映出該受試者與父母間愈好的親子關係。

(四) 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為在學校情境中教師與學生關係的滿意度，當學生感受到教師的支持與協助即有助於師生關係的建立（葉重新，2017）。此變項在國三、高三兩波次是請受試者依「(1) 很滿意」到「(4) 很不滿意」四個答項，來反映其與教師的關係。在大四波次的測量題目則是「你對過去兩年來曾修習過的課程的老師滿不滿意？」，由「(1) 都很滿意」到「(5) 都不滿意」共五個答項來反映師生關係。由於大四波次為五點量尺，須整併為四點量表以利後續分析。本研究首先瞭解其頻率分配為常態，再將中間答項「(3) 一半滿意，一半不滿意」隨機平均分配給「(2)」、「(4)」兩個答項，以將三個波次統一整合為四點量尺。此題分數反向計分後，從0開始編碼，0代表「都不滿意」，1代表「部份滿意，大部分不滿意」，2代表「大部分滿意，小部分不滿意」，3代表「都很滿意」，分數越高反映出受試者師生關係越佳。

針對五點整併為四點量尺的做法，研究者進一步在SPSS 26.0的extension R3.5 使用Rasch評定量尺模型（rating scale model）來檢視其成效。在原先五點量尺中（圖2上），五條試題訊息曲線代碼為「R11：都不滿意」、「R12：小部份滿意，大部分不滿意」、「R13：一半滿意，一半不滿意」、「R14：大部分滿意，小部分不滿意」、「R15：都很滿意」。以R13, R14, R15訊息量較大，其中尤以R13（一半滿意，一半不滿意）的分布範圍為甚。在四點量尺中（圖2下），四條試題訊息曲線代碼設定為「R21：都不滿意」、「R22：部份滿意，大部分不滿意」、「R23：大部分滿意，小部分不滿意」、「R24：都很滿意」。兩相對照可見在原先R13平均分派給R12、R14後，在四點量尺（圖2下），「R22：不太滿意」（原R12）、「R23：還算滿意」（原R14）的訊息曲線下之面積與合併前的五點量尺並無太大差異。

圖2
以Rasch評定量尺模型檢視量尺合併之訊息



肆、研究結果

一、敘述統計

表1顯示在國三（W1）、高三（W2）、大四（W3）三波間，受試者之憂鬱症狀平均分數分別為8.71、7.76、7.61，反映出受試者隨著年齡增長，憂鬱症狀分數略呈下降的趨勢。至於自尊與親子關係分數皆於高三時最低，大致呈現U型的變化；相對地，師生關係的分數則在高三時較高，顯現了倒U型。這些結果和國外並不相同，顯現了台灣在高三準備投考大學時期的特殊性。

就標準差來看，各變項於三個波次未有太大變化，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另外偏態與峰度之絕對值皆符合Kline（2005）的常態分配標準，由此可知本研究之變項大致上符合常態分配，唯有W3憂鬱症狀的分布較正偏且集中。後續模型考驗與估計採用最大概似法（ML）進行。

表1

各變項之敘述統計分析摘要表（ $N = 992$ ）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W1憂鬱	8.71	6.936	0.958	0.507
W2憂鬱	7.76	6.663	1.090	1.093
W3憂鬱	7.61	7.130	1.411	2.104
W1自尊	9.74	2.936	0.011	0.189
W2自尊	9.64	2.942	0.127	0.082
W3自尊	10.10	2.799	0.194	0.405
W1親子	4.12	1.215	-0.360	0.889
W2親子	4.00	1.104	-0.322	1.368
W3親子	4.58	1.213	-0.496	0.195
W1師生	1.89	0.629	-1.029	2.255
W2師生	1.91	0.571	-0.757	2.164
W3師生	1.89	0.532	-0.224	0.699

由表2的變項相關係數矩陣可知，憂鬱症狀、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在各波次中皆呈現正向相關（表中粗體者），顯示研究變項於各波次間的關聯相當穩定。另外，各波次之憂鬱症狀與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間呈現負向相關（表中底線者）介於-.116至-.447之間，皆達 $p < .01$ 的顯著水準，也符合本研究預期。至於各解釋變項之間的相關（表中雙底線者）則在.116至.343之間，其中以W1和W2的親子與師生關係稍高，恐有多元共線性之虞。

表2
研究變項之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W1憂鬱	—											
2 W2憂鬱	.499**	—										
3 W3憂鬱	.361**	.406**	—									
4 W1自尊	<u>-.428**</u>	<u>-.215**</u>	<u>-.145**</u>	—								
5 W2自尊	<u>-.311**</u>	<u>-.447**</u>	<u>-.192**</u>	.449**	—							
6 W3自尊	<u>-.234**</u>	<u>-.287**</u>	<u>-.386**</u>	.344**	.459**	—						
7 W1親子	<u>-.224**</u>	<u>-.126**</u>	<u>-.082**</u>	<u>.257**</u>	.209**	.160**	—					
8 W2親子	<u>-.101**</u>	<u>-.193**</u>	<u>-.103**</u>	.129**	<u>.261**</u>	.162**	.382**	—				
9 W3親子	<u>-.066*</u>	<u>-.101**</u>	<u>-.183**</u>	.091**	.165**	<u>.260**</u>	.310**	.366**	—			
10 W1師生	<u>-.179**</u>	<u>-.077*</u>	<u>-.115**</u>	<u>.189**</u>	.138**	.119**	<u>.343**</u>	.150**	.074*	—		
11 W2師生	<u>-.123**</u>	<u>-.163**</u>	<u>-.095**</u>	<u>.084**</u>	<u>.201**</u>	.145**	.160**	<u>.338**</u>	.104**	.185**	—	
12 W3師生	<u>-.084**</u>	<u>-.111**</u>	<u>-.127**</u>	.069*	.107**	<u>.172**</u>	.050	.129**	<u>.116**</u>	.119**	.150**	—

註：* $p < .05$; ** $p < .01$

接下來，針對研究中992名樣本進行隨機抽樣，抽取出的500筆憂鬱症狀的個別成長軌跡，可大致看出樣本皆有其不同的起始狀態與變化幅度，呈現了非共同起點且非平行的個別軌跡。此外從成長軌跡可以發現，在三個波次中的憂鬱症狀隨時間遞變出現不只一種變化趨勢。為了更進一步呈現群體中的不同憂鬱症狀之情形，本研究採取階層式集群分析中的華德法（Ward's method）來評估集群個數，在評估後所呈現的集群樹狀圖中則顯示分為2到3個集群較為理想。

在評估集群數後，本研究利用較為強健之貝氏SEM估計法（Bayesian estimation）進一步完成模型中的潛在次群體的辨識與個案分派（李茂能，2011；Can et al., 2015）。在個案分派前，先在兩組中分派憂鬱上升與下降組各20筆資料；在三組中則是預先分派為上升、下降及持平各20筆資料進行分派，預先分派符合群體性質的群體性質的訓練資料（training data）能作為估計時分派潛在次群體的依據，並避免在群體辨識以及個案分派時出現標籤錯亂的情形。以貝氏分析結果的適配度指標：Posterior predictive p 來判斷，分派兩組的 p 值為0.50；分派三組的 p 值為0.32，尚不符理想值0.50。根據上述結果，遂分成兩組進行後續分析，並將第一組命名為「低憂鬱組」（ $n = 647$ ）（65.2%），第二組命名為「高憂鬱組」（ $n = 345$ ）（34.8%）。圖3呈現兩組與整體的憂鬱症狀變化差異，並以表3呈現兩組在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的參數估計差異。

圖3
高低憂鬱組與整體憂鬱症狀之分數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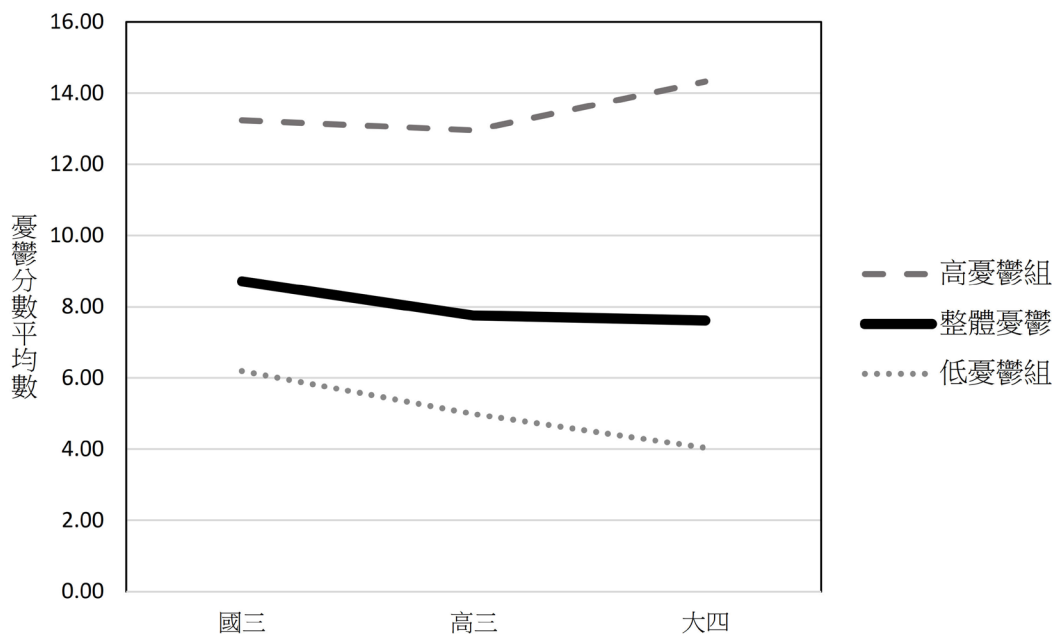


表3
高低憂鬱組之憂鬱症狀潛在成長模式參數估計

	低憂鬱組 ($n = 647$)				高憂鬱組 ($n = 345$)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	p 值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	p 值
固定效果								
截距平均數	6.084	0.174	35.026	***	13.112	0.410	32.017	***
斜率平均數	-0.915	0.082	-11.131	***	0.414	0.266	1.556	.120
隨機效果								
截距變異數	12.496	1.152	10.847	***	17.850	5.350	3.337	***
斜率變異數	1.100	0.303	3.630	***	5.748	2.337	2.459	*
共變與相關								
共變數	-3.429	0.499	-6.869	***	-9.973	3.049	-3.271	**
相關係數	-0.925				-0.985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從表3來看，在低憂鬱組的固定效果方面，憂鬱症狀的截距平均數6.084，斜率平均數為-0.915，顯示在國三時憂鬱症狀平均分數為6.084，在後續波次間的憂鬱症狀平均減少了0.915分。在隨機效果中，低憂鬱組截距、斜率的變異均為顯著，代表國三時的平均分數即有個別差異，以及在後續波次中的憂鬱症狀成長變化情形也有明顯的個別差異性。另外，從共變數數值可以看到，在低憂鬱組中憂鬱截距與斜率為負的共變關係（-3.429），在低憂鬱組中的兩者的方向相反，即高憂鬱截距會導致較低的憂鬱斜率。

在高憂鬱組的固定效果方面，國三憂鬱症狀平均分數為13.112，斜率平均分數為0.414，未達顯著。顯示相較於低憂鬱組，高憂鬱組在國三憂鬱分數雖較高分，但在後續三波未出現較為一致的變化情形。在隨機效果方面，高憂鬱組截距、斜率的變異均為顯著，代表高憂鬱組同樣在國三平均分數、後續變化情形上有明顯的個別差異。從結果中特別可以看到高憂鬱組在變異數參數上，不論是截距或斜率都較低憂鬱組為大，突顯該組的異質變動性。從共變數數值發現，在高憂鬱組中憂鬱截距與斜率為負的共變關係（-9.973），此組中的憂鬱截距與斜率關係與低憂鬱組相同，皆是高憂鬱截距會導致較低的憂鬱斜率，但在高憂鬱組中，此共變情形會更為明顯。

二、整體模型評估

在了解高低組的憂鬱變化情形後，本研究進一步納入三個解釋變項（自尊、親子、師生關係）進行整體模型的估計與評估，採用ML估計研究模型時，透過MI值（Modification Index）發現有幾個參數應該納入估計。其中W2師生關係與親子關係間的殘差（ $\varepsilon 5$ 、 $\varepsilon 8$ ）相關還有同時期的自尊與憂鬱殘差（ $\varepsilon 2$ 、 $\varepsilon 11$ ）相關，其MI值分別高達34.9及17.4。在模型中增加此兩條殘差相關進行分析後，模型的適配指標 $\chi^2 = 424.756$ （ $df = 96$ ），CFI為0.825、NFI為0.788、RMSEA為0.059，仍未符合如表4所示適配度指標之判斷標準。模型配適度不佳有可能是因為違反多元常態所致（邱皓政，2007）。但如本章第一節所述，本研究變項之偏態與峰度皆符合Kline（2005）之常態標準，符合單變項常態，多元峰度係數（Mardia係數）為18.329，也小於Bollen（1989）所提出的判斷標準 $p(p+2)$ （ p 代表觀察變數數量）之值168，表示研究資料符合多元常態。

表4

整體模型配適度指標檢核表

配適度指標	理想數值	原始ML配適結果	Bollen-Stine Bootstrap修正後結果
χ^2	愈小愈好	424.765	102.277
χ^2 / df	$1 < \chi^2 / df < 3$	4.271	1.065
CFI	> 0.95	0.825	0.997
NFI	> 0.90	0.788	0.949
IFI	> 0.90	0.828	0.997
RMSEA	< 0.05	0.059	0.008
Hoelter's N (CN)	> 200	80	932.585
AIC	愈小愈好	592.765	270.28

接下來針對模式配適的評估，本研究另外採取AMOS中Bollen-Stine p-value correction method的方式進行。由於Bollen-Stine之虛無假設為Bootstrap模型卡方值與原先ML模型卡方值沒有差異，本研究經過2,000次Bootstrap後得到之 p 值為0.000（ $p < .01$ ）即代表兩模型有顯著差異。從表4的兩模型對照結果可看出在重新計算後，各項適配度指標均得到明顯改善。綜合以上結果，此研究模型原先適配度不佳，並非模型設定不佳、資料非多元常態所致，而可能是因資料樣本數過大造成（陳寬裕、王正

華，2018）。

此外，為了解決Heywood案例（Heywood cases），即模式中出現負的誤差變異數的情形，參照Chen等人（2001）與Marsh等人（2004）的建議，模型中將兩組憂鬱斜率之殘差變異設定為0.001，且為了排除分組後在低憂鬱組中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出現高共線性情形而影響估計，將兩組自尊、親子與師生截距到憂鬱截距的三個因素負荷量設為等同。

三、整體模型分析結果

首先，圖4為「低憂鬱組」採用ML估計之模型分析結果，為了清楚呈現三個時期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對個體憂鬱症狀的影響，圖4中並未標示解釋變項截距間的關聯（ $\phi_{\text{自親}} = .410$ 、 $\phi_{\text{自師}} = .477$ 、 $\phi_{\text{親師}} = .732$ ）。

圖4

「低憂鬱組」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影響憂鬱症狀之LGCM（標準化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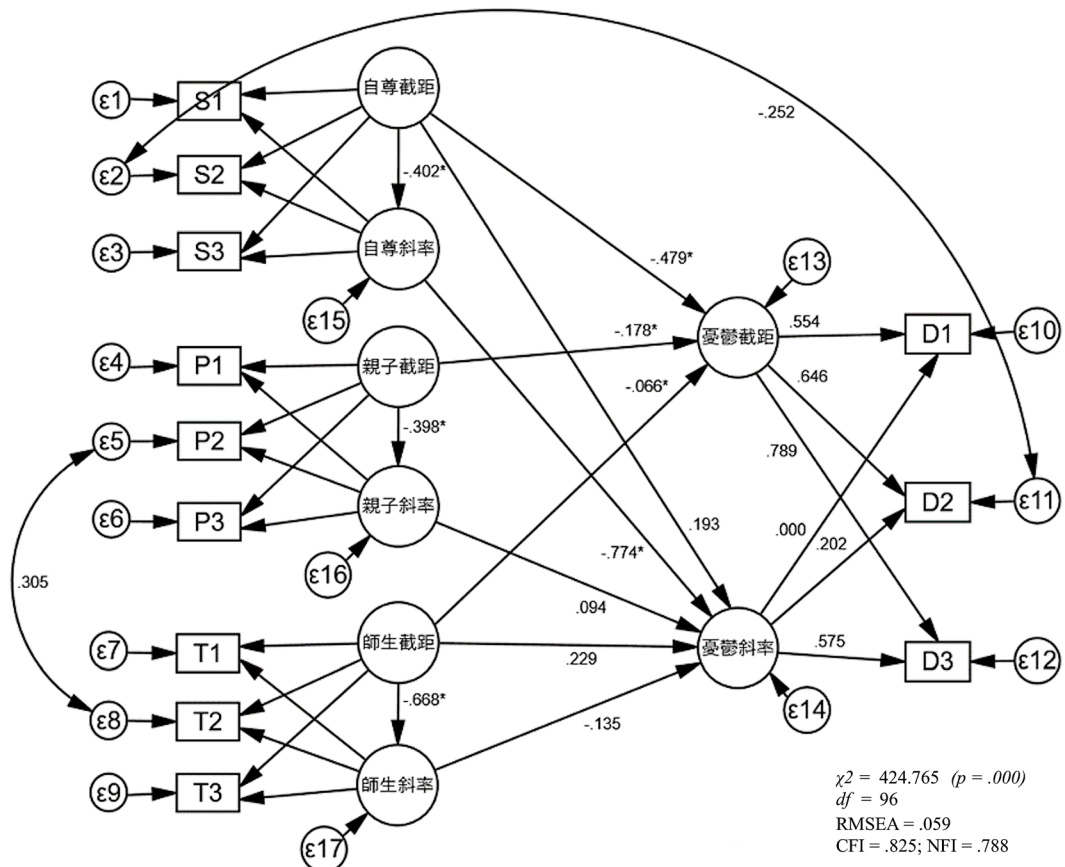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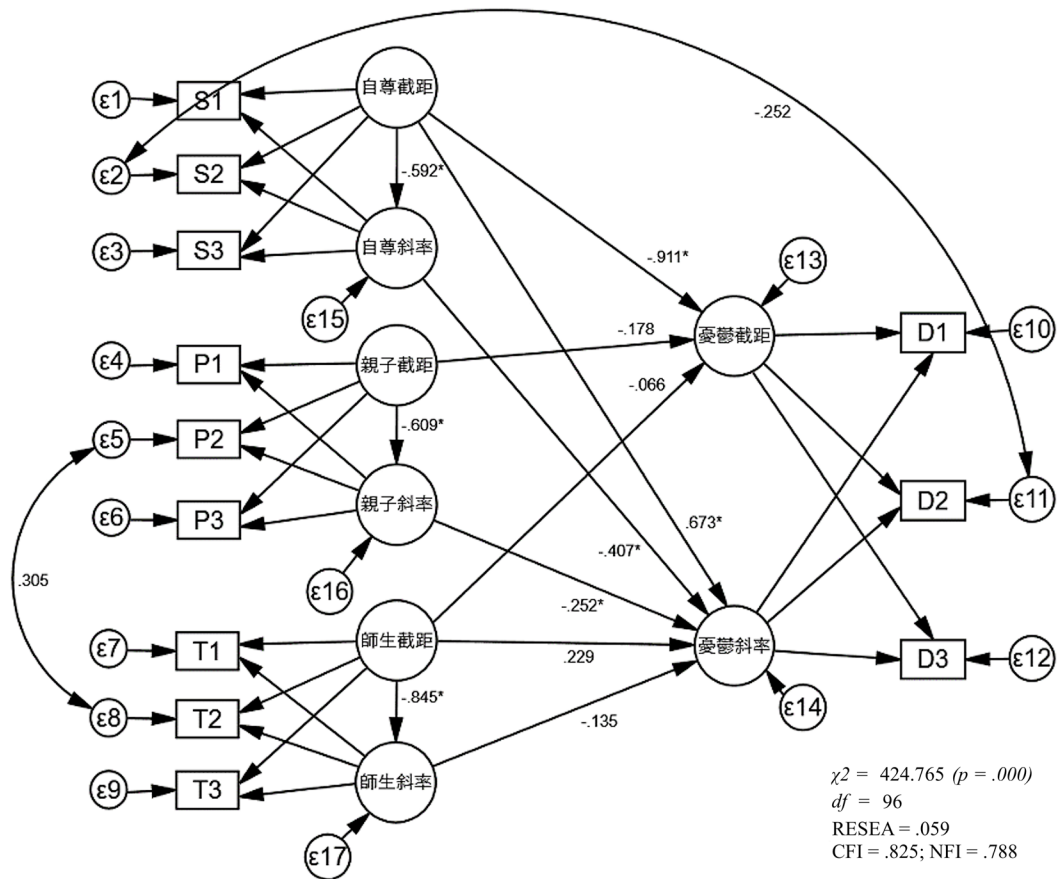


圖5則為「高憂鬱組」採用ML估計之模型分析結果，同樣地，圖中省略解釋變項截距間的關聯呈現（ $\phi_{\text{自親}} = .527$ 、 $\phi_{\text{自師}} = .382$ 、 $\phi_{\text{親師}} = .684$ ）。

圖5

「高憂鬱組」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影響憂鬱症狀之LGCM（標準化係數）



在成長曲線模型中軌跡變化的整體趨勢能利用平均數來反映，也能利用變異數來估計個別差異。當整體的軌跡狀態可用單一係數來表示時，即是固定效果，也就是LGCM中各潛在變數的平均分數；相對來說，樣本整體在成長軌跡中的狀態變化差異則為隨機效果，為潛在變項的變異數，若此數值達顯著水準，即代表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邱皓政，2017；Curran et al., 2010）。表5為兩組在模型中變項固定效果及隨機效果的分析結果，以下分組敘述之。

表5
兩組在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之固定與隨機效果摘要表

	低憂鬱組				高憂鬱組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	<i>p</i> 值	估計值	標準誤	CR值	<i>p</i> 值
固定效果								
自尊截距	10.114	.105	96.589	***	8.746	.157	55.718	***
親子截距	4.094	.043	94.420	***	3.836	.068	56.562	***
師生截距	1.963	.022	91.044	***	1.812	.033	55.104	***
自尊斜率	1.710	.339	5.049	***	2.901	.321	9.038	***
親子斜率	0.775	.172	4.513	***	1.331	.176	7.545	***
師生斜率	0.543	.097	5.625	***	0.619	.083	7.429	***
隨機效果								
自尊截距	4.215	.441	9.560	***	4.741	.793	5.979	***
親子截距	0.581	.073	7.972	***	0.764	.136	5.620	***
師生截距	0.081	.018	4.445	***	0.159	.037	4.341	***

註：** $p < .01$; *** $p < .001$

（一）低憂鬱組

在解釋變項部分，自尊截距（國三自尊平均分數）為10.114，其斜率平均數則為1.710，顯示三波次中自尊分數平均增加1.710分。在親子關係，截距（國三親子關係平均分數）為4.094，斜率則為0.775，顯示在三波次中整體親子關係是上升的。至於師生關係截距（國三師生關係平均分數）為1.963，而斜率平均數為0.543。從上述結果可發現在低憂鬱組中，自尊、親子、師生關係均隨時間呈現上升趨勢。

在隨機效果方面，自尊截距、親子截距與師生截距的變異數也均達顯著水準（ $p < .001$ ），顯示低憂鬱組中三波次的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的狀態變化存在個別差異

性。

（二）高憂鬱組

在解釋變項部分，自尊在國三平均為8.746分，斜率平均數為2.901，整體自尊分數平均增加2.901分。親子關係在國三平均為3.836分，斜率平均分數為1.331，在三波次中平均增加1.331分。師生關係在國三平均為1.812分，平均斜率分數為0.619，也是在三波次中出現上升情形。從上述結果可發現，高憂鬱組在國三時的自尊、親子與師生平均分數均低於低憂鬱組。

最後是隨機效果，自尊截距、親子截距與師生截距的變異數均達顯著水準（ $p < .001$ ），表示高憂鬱組中的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之狀態變化有個別差異。

表6為估計摘要表，以下從各研究假設來說明結果。

1. 研究假設一：各解釋變項之潛在成長參數

在假設H1a，國三的正尊截距對其斜率有顯著負向影響，且低憂鬱組跟高憂鬱組皆符合假設結果，顯示國三時期自尊平均分數高的受試者，相對於平均分數低的受試者會有較低的斜率，即自尊跨時間變化情形較小，其中又以高憂鬱組為甚。在高憂鬱組，自尊截距每上升1分，自尊斜率會下降0.324分。針對假設H1b，親子關係截距對其斜率有顯著負向影響，且低與高憂鬱兩組結果皆符合假設預期，顯示國三時期親子關係平均分數高的受試者，相對於平均分數低的受試者會有較低的斜率，親子關係跨時間的變化情形較不明顯。尤其是高憂鬱組，親子關係截距每上升1分，親子關係斜率會下降0.297分。在假設H1c，師生關係截距對其斜率有顯著負向影響，且低與高憂鬱兩組亦皆符合假設預期。進一步使用Fisher's Z檢定（Senn et al., 2004）來比較兩組係數，發現在假設H1a、H1b有顯著差異（ $p < .001$ ），顯示出對高憂鬱症狀者而言，若國三時有較高的自尊與親子關係，未來自尊與親子分數的斜率變化情形會比低憂鬱症狀者更小。

2. 研究假設二：自尊對憂鬱症狀的影響

在假設H2a，國三自尊截距對國三憂鬱症狀截距有負向影響，且在低與高憂鬱兩組皆獲得支持，顯示國三時期自尊平均分數高的受試者，相對於自尊分數低的受試者，憂鬱症狀的平均分數較低，在Fisher's Z檢定的兩組之路徑係數比較有顯著差異（ $p < .001$ ），高憂鬱組在國三時的自尊越高，此時的憂鬱分數越低，自尊截距每上升1分，憂鬱症狀平均分數會下降2.09分；而在低憂鬱組只有降低0.598分。但在H2b，自尊截距對憂鬱症狀斜率的影響中，結果與原先假設為負向影響不符，低憂鬱

表6

兩組模型結果摘要表

		低憂鬱組 ($n = 647$)				高憂鬱組 ($n = 345$)			
		標準化 係數	未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	p 值	標準化 係數	未標準化 係數	標準誤 標準化	p 值
H1a	自尊斜率 ← 自尊截距	-.402	-0.146	0.033	***	-.592	-0.324	0.036	***
H1b	親子斜率 ← 親子截距	-.398	-0.137	0.042	**	-.609	-0.297	0.045	***
H1c	師生斜率 ← 師生截距	-.668	-0.277	0.049	***	-.845	-0.347	0.045	***
H2a	憂鬱截距 ← 自尊截距	-.479	-0.598	0.073	***	-.911	-2.090	0.374	***
H2b	憂鬱斜率 ← 自尊截距	.193	0.076	0.054	.162	.673	0.876	0.244	***
H2c	憂鬱斜率 ← 自尊斜率	-.774	-0.835	0.196	***	-.407	-0.969	0.221	***
H3a	憂鬱截距 ← 親子截距	-.178	-0.598	0.073	***	-.158	-0.904	0.792	.253
H3b	憂鬱斜率 ← 親子斜率	.094	0.288	0.442	.515	-.252	-1.677	0.744	*
H4a	憂鬱截距 ← 師生截距	-.066	-0.598	0.073	***	.120	1.500	2.193	.494
H4b	憂鬱斜率 ← 師生截距	.229	0.644	0.482	.182	-.098	-0.699	1.769	.693
H4c	憂鬱斜率 ← 師生斜率	-.135	-0.914	1.399	.514	.175	3.026	3.915	.440

註1：* $p < .05$; ** $p < .01$; *** $p < .001$

註2：粗體數字為顯著係數，另於文中解釋。

組為不顯著，而高憂鬱組為正向影響，自尊截距每上升1分，憂鬱斜率也會增加0.876。假設H2c則獲得兩組結果支持，自尊斜率每上升1分，在低與高憂鬱組的憂鬱症狀斜率分別下降了0.835分與0.969分。

3. 研究假設三：親子關係對憂鬱症狀的影響

在研究假設三，親子關係和憂鬱症狀於高低兩組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在假設H3a，低憂鬱組國三親子關係的截距能夠負向影響國三憂鬱症狀截距，親子關係上升1分，憂鬱症狀截距會下降0.598分，但在高憂鬱組影響則並不顯著。在假設H3b，低憂鬱組未獲支持，反倒是高憂鬱組親子關係的斜率會顯著負向影響憂鬱症狀的斜率，顯示親子關係的跨時間變化幅度越大，憂鬱症狀變化幅度相較於低憂鬱組來得小；親子關係斜率每上升1分，憂鬱症狀的斜率會下降1.677分。

4. 研究假設四：師生關係對憂鬱症狀的影響

在假設H4b獲得支持，在低憂鬱組中的師生關係分數的截距會負向影響憂鬱症狀的截距，顯示師生關係截距上升1分，憂鬱症狀截距會下降0.598分，但假設H4a與H4c都未獲支持，在兩組中師生關係的斜率對憂鬱症狀截距、師生關係分數的斜率對憂鬱症狀斜率變化則皆不顯著。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潛在成長曲線模式探討國三、高三到大四成年初顯期三波間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的變化，並進一步分為高低憂鬱組，觀察三變項之截距（起始分數）、斜率（變化幅度）影響憂鬱症狀分數變化的情形。整體而言，高憂鬱組在自尊、親子與師生關係上的固定效果都比低憂鬱組來得小，且波動也比較大。根據研究結果分析，將研究結論、討論與建議呈現如下。

一、研究結論與討論

（一）自尊變化及其對憂鬱症狀分數之影響

無論在高低憂鬱組，在國三時的自尊平均分數皆會負向影響往後的自尊分數變化幅度，且國三的正尊會負向影響國三的憂鬱症狀，至於自尊的分數變化幅度，也會對憂鬱症狀的後續分數變化幅度產生負向影響，和過去文獻一致。故我們要注意個體成長歷程中自尊的起始狀態與幅度變化對個體憂鬱症狀變化趨勢的影響，顯示長期自尊

的建構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倘若個體在青春期時建立個人自尊，或是在未來有機會能發展良好自尊，在未來面對生命歷程的轉折時，自尊也能夠幫助個體擁有較佳的心理健康，成為緩解憂鬱症狀的保護因子。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高憂鬱組中的自尊國三平均分數對後續憂鬱症狀分數的變化幅度產生正相關，顯示高自尊的個體在未來憂鬱症狀的變化幅度較大。雖然與原先研究假設不一致，也與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對國中階段的研究結果不同，但此結果能夠以Baumeister等人（2003）及Kim與Chiu（2011）針對高自尊的黑暗面研究來詮釋。倘若個體僅擁有過於膨脹的高自尊但無法容忍挫折與失敗，在面對困難時個體反倒會因心理負擔而產生壓力，進而加大憂鬱症狀的變化。

（二）親子關係變化及其對憂鬱症狀分數之影響

無論在高低憂鬱組，親子關係國三平均分數皆是負向影響後續親子關係的分數變化幅度。親子關係越良好的個體，未來關係的變化幅度較小，但親子關係越差的個體，在後續親子關係可能會有較大的改變幅度，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相符，也與文獻一致（吳齊殷、黃鈺婷，2010）。但是，高低憂鬱兩組在親子關係對憂鬱症狀則有不同結果。本研究發現在低憂鬱組中，國三時的親子關係平均分數對憂鬱症狀平均分數有負向影響，和文獻一致；而親子關係的變化幅度對憂鬱的變化幅度卻沒有明顯影響，反倒是高憂鬱組在這部分是顯著的，此結果代表對於高憂鬱群體來說，相較於親子關係在國三時的好壞，後續的變化幅度才是真正影響長期憂鬱變化的關鍵，也因此，才會導致未來個體親子關係的上升幅度越大、憂鬱症狀分數下降也越快的結果。此結果不僅和簡伶蓁（2009）與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的研究結果相符，也顯現出即使個體在早期曾有不利的家庭經驗，倘若能在後續得到穩定家庭支持，將能改善個體的憂鬱症狀。

（三）師生關係變化及其對憂鬱症狀分數之影響

不論高低憂鬱組，國三的師生關係平均分數皆會負向影響後續師生關係分數的變化幅度，與文獻一致。此結果顯示若在青少年時期個體擁有較為良好的師生關係，未來師生關係變化幅度將會較為平穩，再者，在低憂鬱組的國三師生關係平均分數會負向影響國三時的憂鬱平均分數，不過對於高憂鬱組而言就沒有顯著。這個發現突顯了國三時期的高憂鬱群體在生活場域中可能有其他關鍵因素會對其憂鬱症狀產生影響，相較之下，教師的影響效果就有所侷限。至於不論高低憂鬱組，師生關係的國三平均分數及長期狀態間變化幅度都不會影響憂鬱分數的變化幅度，與研究假設不符。有可

能是本研究延伸國外研究的國高中場域（Reddy et al., 2003; Wang et al., 2013）至成年初顯期，當個體進入大學後，隨著生活重心的轉移，個體憂鬱症狀可能受其他脈絡中更重要的因素所影響，故長期來看，國三的師生關係平均分數的影響就變得不明顯。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雖然本研究藉由延續至成年初顯期的探討，顯現了在個體的生命歷程中自尊、家庭與學校脈絡在其生涯發展階段的重要性，但在研究過程也能夠發現以下限制。首先，本研究中囿於資料庫中各波次題目需一致的限制，在題目選擇上以受試者所回答的滿意度代表所測變項概念，如本研究中親子關係由受試者之親子滿意度反映，師生關係則以受試者之師生滿意度為代表。此外，由於本研究在親子關係的樣本篩選過程中僅保留了雙親健在的家庭，排除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家庭的樣本，並無法涵蓋到所有家庭情況的個體。最後，由於所採題目與波次間隔等緣故，本研究所選擇的三個波次間隔較長，以致僅能呈現綜觀的分數變化趨勢，未能反映個體自青春期開始的逐年變化，若希望能更明確地描繪個體在特定時期的發展軌跡，建議未來研究者能選擇連續數個波次進行探討。

以下再針對教學及輔導實務與研究提出建議：

（一）教學與輔導建議

首先在實務面上，本研究建議未來教師、輔導人員在教學現場進行輔導時，能藉由對學生成長歷程的了解，將可能需要關懷的個體進行早期介入與預防。如本研究顯示個體的憂鬱症狀分數變化有許多的影響因素，不僅僅由單一因素定奪，這也顯現了介入改善個體心理健康的積極性。相對於親子或師生關係，自尊為影響憂鬱症狀的重要變項，顯示若在青少年時期能夠擁有較高的自尊，憂鬱症狀分數也會較低。教學與輔導人員可以透過幫助學生解決學業困難、完成日常交辦任務，或是在個體面臨抉擇時給予支持等，協助其建立良好自尊。研究結果也顯示，自尊過高或過低都有可能對個體產生不良影響，

因此輔導人員在進行自尊相關輔導時，應視個體的正尊特徵進行專業評估後，再行探究適合個體自尊的輔導策略，提升對於個體特徵的敏感度，以免忽略高自尊對個體的負面影響。

再來，個體親子關係的變化也是輔導時需要關注的面向。對於低憂鬱學生，良好的親子關係可以降低憂鬱症狀，但對高憂鬱學生，親子關係的穩定更是重要，才不會造成憂鬱症狀更大幅度的變動。若教師端能保持與家長的良好溝通與建立雙方的信任

關係，未來當親子關係發生變化、青少年情緒出現狀況時，教師才能夠及時提供家長親子溝通之建議，並給予家長情緒上的支持，要讓他們知道許多事情都可以雨過天青，親子關係終究會有撥雲見日的一天。

最後，本研究也顯示在低憂鬱組中的國三師生關係將影響憂鬱症狀，顯現了教師角色在國中階段有其重要性，教師可藉由提供穩固的心理與社會資本，促使個體在變動的階段中獲得安定感，以降低憂鬱症狀的出現。但需要留意的是，對高憂鬱組的學生而言，其自尊的重要性遠大於教師支持，這是實務工作者需要敏覺之處。在實務應用上，能夠透過其他影響因素的改善來促進個體正向情緒的開展，如父母親與同儕朋友的支持力量、校園正向組織的形塑等。而國三時高低憂鬱組別的不同結果，也蘊含著積極意涵：教學輔導人員在進行輔導時，若能在評估其個別生活脈絡和個體差異後，實施相關個別化輔導策略與介入，將能增進心理諮商的成效，給予個體需要的協助與支持。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中採取三個波次進行研究、波次間隔距離較長，考量到研究模型的複雜度，研究中僅分為高低憂鬱兩組進行探討，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納入更多波次進行縱貫研究，以呈現群體中多元軌跡的異質性，如增加國小階段波次，更可向下延伸探討國小時期師生關係對個體的影響。此外，從分析結果的修正指標（MI）中發現，在高三時期的自尊與憂鬱間、親子與師生關係間的兩組殘差相關均出現了較高數值，顯示於此時期中應存有其他因素是本研究模型中尚未納入的，兩者間或許有中介或調節變項可進一步探討。最後未來研究也可分為高自尊與低自尊兩組來比較，使自尊發展的影響機制更加明朗。此外，由於本研究中為了反映時間變化所帶來的差異，所選擇解釋變項皆為隨時間變動（time-varying）之變數，建議未來研究中也加入不隨時間變動（time-invariant）之變項，例如性別，以反映不同群體間的變化差異。

參考文獻

- 王玉珍、吳麗琴（2009）：大一生回顧升學生涯抉擇與生涯適應之脈絡相互影響模式探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5，39-79。[Wang, Y. C., & Wu, L. C. (2009). Building a contextual-influenced model of career decision making and career adjustment: Retrospection from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5, 39-79. <https://doi.org/10.7082/CJGC.200903.0039>]
- 王郁琮（2013）：應用成長混合模式剖析臺灣青少年憂鬱發展軌跡的異質性：六步驟策略性模式發展機制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9（4），119-147。[Wang, Y. C. (2013). Application of growth mixture model to heterogeneous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moods of adolescents: A six-step strategic model development mechanis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9(4), 119-147. <https://doi.org/10.3966/181665042013120904005>]
- 王郁琮、李佳儒（2018）：國中青少年三波段自尊類型潛藏轉移對心理適應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0（1），53-82。[Wang, Y. C., & Li, J. R. (2018).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n latent transition of self-esteem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adolescence.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1), 53-82. [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9_50\(1\).0003](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9_50(1).0003)]
- 伊慶春（2008）。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三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C00178_2）【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Yi, C. C. (2008). *Taiwan youth project: J1W3S(public access data)* (C00178_2)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https://doi.org/10.6141/TW-SRDA-C00178_2-1]
- 伊慶春（2019）：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六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C00238_3）【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Yi, C. C. (2019). *Taiwan youth project: J1W6S(public access data)* (C00238_3)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https://doi.org/10.6141/TW-SRDA-C00238_3-2]
- 伊慶春（2019）：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九波，青少年問卷（公共版）（D00124_1）【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Yi, C. C. (2019). *Taiwan youth project: J1W9S(public access data)* (D00124_1)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Academia Sinica. 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24_1-2]
- 江守峻、陳婉真（2018）：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同社經地位青少年的父母支

- 持、同儕支持與心理健康之關係。《教育學報》，46（2），21-24。[Chiang, S. C., & Chen, W. C. (2018).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mental health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and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Education Journal*, 46(2), 21-24. <https://doi.org/10.6814/THE.NCCU.MPCG.004.2019.F01>]
- 余民寧（2013）：書評：潛在成長曲線模式。《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1（2），149-159。[Yu, M. N. (2013). Book review: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1(2), 149-159. <https://doi.org/10.6151/CERQ.2013.2102.05>]
- 吳齊殷、黃鈺婷（2010）：青少年初期身心健康變化及其動態影響變因之討論。《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4），535-562。[Wu, C. I., & Huang, Y. T. (2010). The impact of dynamic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early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3(4), 535-562.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012_23\(4\).0002](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012_23(4).0002)]
- 呂玉瑕、周玉慧（2015）：二十一世紀台灣青少年性別角色態度之形成與變遷。《台灣社會學刊》，58，95-155。[Lu, Y. H., & Jou, Y. H. (2015). The gender-role attitudes construc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in the 21th century's Taiwan.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8, 95-155.]
- 呂玟承（2017）：台灣青少年憂鬱情緒發展之潛在成長模式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銘傳大學。[Lu, W. C. (2017). *A latent growth model of Taiwanese teenagers' depressive mood over tim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ing Chuan University.]
- 巫博瀚、陸偉明（2010）：延宕交叉相關與二階層線性成長模式在台灣青少年自尊的發現。《測驗學刊》，57（4），541-565。[Wu, P. H., & Luh, W. M. (2010). Teenagers'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in Taiwan: Cross-lagged panel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growth model. *Psychological Testing*, 57(4), 541-565. <https://doi.org/10.7108/PT.201012.0541>]
- 李佩珊（2019）：Bronfenbrenner生態系統理論的近期發展與應用。《輔導季刊》，55（3），14-24。[Lee, P. S. (2019). Recen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ronfenbrenner ecosystem theory. *Guidance Quarterly*, 55(3), 14-24.]
- 李茂能（2011）：圖解Amos在學術研究之應用。五南。[Li, M. N.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graphic Amos and its uses in research*. Wu-Nan.]
- 周玉慧（2015）：青少年至成年初期親子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7（1），67-89。[Jou, Y. H. (2015). Longitudinal effect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7(1), 67-89. <https://doi.org/10.6129/CJP.20140831>]

- 林淑惠（2015）：高中職學生學校生活與主觀幸福感關係之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0**（2），83-106。[Lin, S. H.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facto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30(2), 83-106. <https://doi.org/10.7040/JGC.200811.0083>]
- 林惠雅、蕭英玲（2017）：青少年時期親子關係滿意度的變化：生態脈絡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9**（1），95-111。[Lin, H. Y., & Hsiao, Y. L. (2017). Chang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during adolescence: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tex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9(1), 95-111. <https://doi.org/10.6251/BEP.20161007>]
- 邱皓政（2007）：斷裂時代中的量化研究：統計方法學的興起與未來。 $\alpha \beta \gamma$ 量化研究學刊，**1**（1），1-53。[Chiou, H. J. (2007).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fault line: The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alpha \beta \gamm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1(1), 1-53.]
- 邱皓政（2017）：多層次模式與縱貫資料分析：Mplus 8 解析應用。五南。[Chiou, H. J. (2017). *Multilevel modeling and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Applications of Mplus 8*. Wu-Nan.]
- 張虹雯、王麗斐（2015）：憂鬱情緒與求助延宕的關連：自我污名化、社會污名化與自我隱藏之中介效果考驗。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4**，37-68。[Chang, H. W., & Wang, L. F. (2015).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ed mood and help-seeking delay: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tigma.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4, 37-68.]
- 張虹雯、陳金燕（2010）：憂鬱情緒當事人之求助歷程及影響因子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1-38。[Chang, H. W., & Chen, C. Y. (2010). Help-seeking proces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among clients with depressed mood.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7, 1-38. <https://doi.org/10.7082/CJGC.201003.0001>]
- 許警麟（2013）：國中生人際關係與憂鬱情緒之關聯：感恩的調節作用（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Hsu, C. L. (2013). *A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depression: The mediation of gratitude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6844/NCKU.2013.01252>]
- 陳杏容（2017）：探討不同風險程度的國中生之憂鬱情緒的保護與資源因子。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0**，29-62。[Chen, H. J. (2017). Examining protective and resources factors for depress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xperiencing different levels of family risk.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0, 29-62. <https://doi.org/10.>

- 3966/172851862017120050002]
- 陳寬裕、王正華（2018）：結構方程模型：運用AMOS分析。五南。[Chen, K. Y., & Wang, C. H. (201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ly AMOS to analysis*. Wu-Nan.]
- 黃玉（2000）：大學學生事務的理論基礎—台灣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之研究。公民訓育學報，9，161-200。[Huang, Y. (2000). A theory foundation in college student affairs-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Bulletin of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9, 161-200.]
- 黃春枝（1986）：青少年親子關係適應與父母管教態度之研究。教育與心理研究，9，83-96。[Hwang, C. J. (1986). Study of parent-adolescent adjustment and parental disciplinary attitude. *Journal of Education & Psychology*, 9, 83-96.]
- 黃昱得（2014）：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多元風險因子：個別效果與累積效果的驗證。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7（3），327-355。[Huang, Y. T. (2014). Adolescent depressive mood and multiple risk factors: A test of individual and cumulative effects.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7(3), 327-355.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409_27\(3\).0001](https://doi.org/10.30074/FJMH.201409_27(3).0001)]
- 黃鈺婷（2011）：個人、家庭與學校脈絡中的影響變因與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軌跡之討論。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9，161-181。[Huang, Y. T. (2011). The impact of self-esteem, factors in family and school contexts o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29, 161-181. <https://doi.org/10.7082/CJGC.201104.0161>]
- 黃德祥（1994）：青少年發展與輔導。五南。[Huang, D. H. (1994).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guidance*. Wu Nan.]
- 葉重新（2017）：教育心理學。心理。[Yeh, C. H. (2017). *Educational psychology*. Psychological.]
- 劉宗幸、江守峻（2020）：家庭與學校依附脈絡因子對台灣青少年憂鬱症狀發展之縱貫研究。教育學報，48（2），135-155。[Liu, T. H., & Chiang, S. C. (2020).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family and school attachment factors on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Education Journal*, 48(2), 135-155.]
- 簡伶蓁（2009）：日常生活壓力、家庭支持及因應方式與青少年憂鬱情緒之關係：從學生七至九年級之變化趨勢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Chien, L. C. (2009). *The association of daily stress, family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 A longitudinal study follow from grade 7 to 9*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魏琦芳（2008）：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因素一貫時性研究。醫護科技學刊，10

- (4) , 251-266 。 [Wei, C. F. (2008). Influences of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 longitudinal study. *The Journal of Health Science*, 10(4), 251-266. [https://doi.org/10.6563/TJHS.2008.10\(4\).3](https://doi.org/10.6563/TJHS.2008.10(4).3)]
-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469-48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5.469>
- Ausubel, D. P. (2002). *Theory and problems of adolescent adjustment* (3rd ed.). Grune and Stratton.
- Baharudin, R., & Zulkefly, N.S. (2009). Relationships with father and mother,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ongst college stud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6, 86-94.
-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1), 1-44. <https://doi.org/10.1111/1529-1006.01431>
- Bernichon, T., Cook, K. E., & Brown, J. D. (2003). Seeking self-evaluative feedback: The interactive role of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view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194-204.
- Birkeland, M. S., Melkevik, O., Holsen, I., & Wold, B. (2012). Trajectories of global self-esteem development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5, 43-54.
- Bollen, K. A. (1989). *Structural equations with latent variables*. Wiley.
-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Basic Books.
- Branje, S., & Meeus, W. (2017).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y, turbul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 fiv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8), 1772-1788.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16-0627-7>
- Brausch, A. M., & Decker, K. M. (2014).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as moderators of depression, body image, and disordered eating for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2, 779-789. <https://doi.org/10.1007/s10802-013-9822-0>
-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onfenbrenner, U., & Morris, P. (1998). 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In W. Damon (Series Ed.) & R. M. Lerner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1.*

-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5th ed., pp. 993-1028). Wiley.
- Calvo, R. A., Markauskaite, L., & Trigwell, K. (2010).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experiences and satisfaction about teaching quality in engineering.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ngineering*, 16, 325-338. <https://doi.org/10.1080/22054952.2010.11464049>
- Can, S., van de Schoot, R., & Hox, J. (2015). Collinear latent variables in multilev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 comparison of maximum likelihood and Bayesian estimation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75(3), 406-427.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14547959>
- Chen, F., Bollen, K., Paxton, P., Curran, P., & Kirby, J. B. (2001). Improper solution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9, 468-508.
- Curran, P. J., Obeidat, K., & Losardo, D. (2010). Twelv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growth curve modeling.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11(2), 121-136. <https://doi.org/10.1080/15248371003699969>
- De Goede, I. H. A., Branje, S. J. T., & Meeus, W. H. J. (2009).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parent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 75-88.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08-9286-7>
- De Wit, D. J., Karioja, K., Rye, B. J., & Shain, M. (2011). Perceptions of declining classmate and teacher support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to high school: Potential correlates of increasing student mental health difficultie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48, 556-572. <https://doi.org/10.1002/pits.20576>
- Derogatis, L. R. (1983). *SCL-90-R administration, scoring, and procedure manual-II*. Clinical Psychometric Research.
- Fredriksen, K., & Rhodes, J. (2004). The role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lives of student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103, 45-54. <https://doi.org/10.1002/yd.90>
- Ge, X., Lorenz, F. O., Conger, R. D., Elder, G. H., Jr., & Simons, R. L. (1994). Trajectorie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0, 467-483.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30.4.467>
- Halx, M. D. (2010). Re-conceptualiz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 through the lens of adult education: Regarding undergraduates as adults.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5, 519-530. <https://doi.org/10.1080/13562517.2010.491909>
- Hughes, J. N., Cavell, T. A., & Willson, V. (2001). Further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al significance of the quality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39, 289-301. [https://doi.org/10.1016/S0022-4405\(01\)00074-7](https://doi.org/10.1016/S0022-4405(01)00074-7)

- Kessler, R. C., Avenevoli, S., & Merikangas, K. R. (2001). Mood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 epidemiologic perspective. *Society of Biological Psychiatry*, 49, 1002-1014. [https://doi.org/10.1016/S0006-3223\(01\)01129-5](https://doi.org/10.1016/S0006-3223(01)01129-5)
- Kim, J. K., Conger, R. D., Elder, G. H., & Lorenz, F. O. (2003). Reciprocal influences between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Child Development*, 74, 127-143.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525>
- Kim, Y. H., & Chiu, C. Y. (2011). Emotional costs of inaccurate self-assessments: Both self-effacement and self-enhancement can lead to dejection. *Emotion*, 11(5), 1096-1104. <https://doi.org/10.1037/a0025478>
- Kline, R. B. (2005).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nd ed.). Guilford.
- Lewis, G., Collishaw, S., Thapar, A., & Harold, G. T. (2014). Parent-child hostility and child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ymptoms: The direction of effects, role of genetic factors and gender. *Europea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23, 317-327. <https://doi.org/10.1007/s00787-013-0460-4>
- Marsh, H. W., Dowson, M., Pietsch, J., & Walker, R. (2004). Why multicollinearity matters: A reexamin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self-efficacy, self-concept, and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6(3), 518-522. <https://doi.org/10.1037/0022-0663.96.3.518>
- McGee, R., Williams, S., & Nada-Raja, S. (2001). Low self-esteem and hopelessness in childhood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9, 281-291. <https://doi.org/10.1023/a:1010353711369>
- Midgley, C., Middleton, M. J., Gheen, M. H., & Kumar, R. (2002). Stage-environment fit revisited: A goal theory approach to examining school transition. In C. Midgley (Ed.), *Goals, goal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of adaptive learning* (pp. 109-142). Erlbaum.
- Ogwo, A. (2013). Adolescents-parent relationships as perceived by younger and older adolescents. *IFE Psychologia*, 21, 224-229.
- Orth, U., Robins, R. W., & Meier, L. L. (2009).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low self-esteem and stressful events on depression: Findings from three longitudinal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 307-321.
- Orth, U., Robins, R. W., & Roberts, B. W. (2008). Low self-esteem prospectively predicts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695-70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5.3.695>
- Orth, U., Robins, R. W., & Widaman, K. F. (2012). Life-span development of self-esteem and

- its effects on important life outcom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1271-1288. <https://doi.org/10.1037/a0025558>
- Pianta, R. C., Hamre, B., & Stuhlman, M. (2003).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achers and children. In W. M. Reynolds & G. E. Miller (Eds.),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psychology* (Vol. 7, pp. 199-234). Wiley.
- Pipp, S., Shaver, P., Jennings, S., Lamborn, S., & Fischer, K. W. (1985). Adolescents' theori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8(4), 991-100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8.4.991>
- Reddy, R., Rhodes, J. E., & Mulhall, P. (2003).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 support on student adjustment in the middle school years: A latent growth curve stud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5, 119-138.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03000075>
- Reinherz, H. Z., Giaconia, R. M., Hauf, A. M., Wasserman, M. S., & Silverman, A. B. (1999). Major depress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Risks and impairm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08(3), 500-510.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08.3.500>
- Rieger, S., Göllner, R., Trautwein, U., & Roberts, B. W. (2016). Low self-esteem prospectively predicts depress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young adulthood: A replication of Orth, Robins, and Roberts (2008).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0(1), e16-e22. <https://doi.org/10.1037/pspp0000037>
- Rohde, P., Lewinsohn, P. M., & Seeley, J. R. (1990). Are people changed by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an episode of depression? A further test of the scar hypothe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9(3), 264-271.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99.3.264>
- Rosenberg, M. (1986). Self-concept from middle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In J. Suls & A. G. Greenwald (Eds.),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elf*, 3 (pp. 107-136). Erlbaum.
- Rosenberg, M., Schooler, C., Schoenbach, C., & Rosenberg, F. (1995).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141-156.
- Rueger, S. U., Malecki, C. K., & Demaray, M. K. (2010).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 source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in early adolescence: Comparisons across gender.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9, 47-61.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08-9368-6>
- Sabol, T. J., & Pianta, R. C. (2012). Recent trends in research on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14, 213-231. <https://doi.org/10.1080/14616734.2012.672262>

- Senn, T. E., Espy, K. A., & Kaufmann, P. M. (2004). Using path analysis to understand executive function organiza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Developmental Neuropsychology*, 26(1), 445-464. https://doi.org/10.1207/s15326942dn2601_5
- Simons-Morton, B. G., Crump, A. D., Haynie, D. L., Saylor, K. E., Eitel, P., & Yu, K. (1999). Psychosocial, school, and par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cent smoking among early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 *Preventive Medicine*, 28, 138-148.
- Singer, J. D., & Willett, J. B. (2003). *Applied longitudinal data analysis: Modeling change and event occurr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wislo, J. F., & Orth, U. (2013). Does low self-esteem predict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 213-240. <https://doi.org/10.1037/a0028931>
- Szepeswol, O., Simpson, J. A., Griskevicius, V., & Raby, K. L. (2015). The effect of unpredictable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s on parenting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9(6), 1045-1067. <https://doi.org/10.1037/pspi0000032>
- Taylor, S. E., & Brown, J. D. (1988).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 193-210.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3.2.193>
- Videon, T. M. (2002). The effect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separation on adolescent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489-503.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37.2002.00489.x>
- Wang, M. T., & Eccles, J. S. (2012). Social support matters: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three dimensions of school engagement from middle to high school. *Child Development*, 83, 877-895.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12.01745.x>
- Wang, M. T., Brinkworth, M., & Eccles, J. S. (2013). Moderating effects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adolescent trajectories of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adjust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690-705. <https://doi.org/10.1037/a0027916>
- Watson, D., Suls, J., & Haig, J. (2002). Global self-esteem in relation to structural models of personality and affectiv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1), 185-1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3.1.185>
- Wickrama, K. S., Wickrama, T., & Lott, R. (2009). Heterogeneity in youth depressive symptom trajectories: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young adult physical heal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45, 335-343.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1). *Depression*.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

detail/depression

- Wu, P. C. (2017).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arly adolescence: An examination of school-related factors. *Journal of Psychoeducational Assessment, 35*(8), 755-767. <https://doi.org/10.1177/0734282916660415>
- Yi, C. C., Fan, G. H., & Chang, M. Y. (2012). The developmental outcome of Taiwanese youth: Effects of educational tracking during adolescents. In C. C. Yi (e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pp. 157-184).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7-4081-5_8
- Yi, C. C., Wu, C. I., Chang, Y. H., & Chang, M. Y. (2009).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aiwanese youth: School versus family context from early to late adolescence.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4*, 397-429. <https://doi.org/10.1177/0268580909102914>
- Young, J. F., Berenson, K., Cohen, P., & Gracia, J. (2005). The role of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community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5*, 407-423. <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05.00105.x>
- Zepke, N., & Leach, L. (2010) Improving student engagement: Ten proposals for action. *Activ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11*, 167-177.
- Zhou, J., Li, X., Tian, L., & Huebner, E. S. (2020).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low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in early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lonelines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93*, 54-71. <https://doi.org/10.1111/papt.12207>

收件日期：109年08月17日

一審日期：110年03月19日

二審日期：110年06月27日

三審日期：110年10月24日

通過日期：110年11月17日

The Impact of Self-Esteem, Parent-Child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on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Emerging Adulthood

Yi-Rou Chen*

Wei-Ming Luh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ression i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rea in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Investig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s a continuing concern for adolescents. Recently, an increased interest extends to emerging adulthood.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previous studies in process-person-context-time model hav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factors such as ideal sel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trajectori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rom adolescence to emerging adulthood by considering three predictors — self-esteem, parent-child,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Using AMOS 23.0, two factor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with random intercepts and random slope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longitudinal data. In this panel study, a sample of 992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in three waves from 2002 to 2009 (at Grade 9, Grade 12, and the senior year of undergraduate). The average scores in each of the three waves served as indicators of latent intercepts and slopes for each of the four study variables. By using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with dendrogram, we were able to divide all subjects into two groups as low and high depressive symptom groups respectively.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with correspondent eleven research hypotheses were investigated. That is, H1a: The intercept of self-esteem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correspondent slope of self-esteem. H1b: The intercep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correspondent slop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1c: The intercep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correspondent slope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2a: The intercept of self-esteem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cep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2b: The intercept of self-esteem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lop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2c: The slope of self-esteem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lop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3a: The intercep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cept of

* Corresponding author: Yi-Rou Chen, email: u36071011@gs.ncku.edu.tw
doi: 10.53106/172851862022010063003

depressive symptoms. H3b: The slop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lop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4a: The intercep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intercep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4b: The intercept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lop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4c: The slope of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ha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slop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intercepts of self-esteem, parent-child, an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ll negatively affected their respective slopes. In addition, the intercepts of the high depressive group on these three variables were lower, and the slopes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of low depressive group. (2) Among the three predictors, self-esteem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he intercept of self-esteem affected the intercep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slope in self-esteem also affected the slope i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both groups. Surprisingly, in the high depressive symptom group, people with high self-esteem in Grade 9 had a higher positive depressive symptom slope in the future. (3) The intercept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intercep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the low depressive symptom group, while the slope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ffected the slope in depressive symptoms for the high depressive group. (4) The intercept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intercept of depression symptoms only in the low depressive symptom group. Based on thes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In brief,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long-term self-esteem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even if an individual has good self-esteem from the beginning.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self-esteem are likely to have greater chang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future. If an individual has high self-esteem but cannot tolerate setbacks and failures, the slope in depressive symptoms will increase. Moreover, even if individuals have unfavorable family experiences in the early stages, they still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showing that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s not limited to a single point in time. Finally,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early adolescence not only shows its long-term influence, but also becomes an individual's protective factor for depression, helping individual to have better adaptability in future.

Keywords: Depressive symptom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elf-esteem, Taiwan Youth Projec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